



“洋人眼中的西藏”

译丛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

Qingkang Zangqu De Maoxian Shengya

王启龙 主编

[英] W. W. 福格森/著 张文武/译 张皓/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

(英)W·W·福格森 著

张文武 译

张皓 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 / (英)福格森(Fergusson W. W)著;张文武译.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3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任启龙主编)

ISBN 7-223-01491-1

I. 青... II. ①福... ②张... III. ①游记—青海省②
游记—四川省 IV. 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2336号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

QINGKANG ZANGQU DE MAOXIAN SHENGYA

作 者	[英]福格森 著
译 者	张 文 武
校 订 者	张 皓
责任编辑	叶 建 华
封面设计	萧 辉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3号)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 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7-223-01491-1/I·34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尧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的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出版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源源不断的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叩动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

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者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的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雪域旧旅”译丛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即19世纪后半叶——译者注)的整整50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想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

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忙中偷闲，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有关出版社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主 编 前 言

王启龙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多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①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时光任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 20 世纪,刚刚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心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

^① 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 32 卷第 2 期,1929 年版,7-8 页。

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80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目前已经出到第15辑,第16辑稿子已经基本齐备。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解放前曾有译文,比如英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1929年就有刘光炎(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现代标点,而且错误极多^①,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

^① 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1932年在《西北研究》第3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评指正。

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之衰弱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 and 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几,旧中国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国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誉叩动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的。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在不同程度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那样的根深蒂固、那样的难以动摇。相反,许多人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而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普通的读者就更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将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了。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在藏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在藏经营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的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 1.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

必要的地方加注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尼泊尔等国家)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套译丛是我们已经推出的“雪域旧旅”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继续。因此,由王尧先生写的总序和我的主编前言几乎没有改动。“雪域旧旅”早该在两年前出版,由于选题的特殊和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某出版社的耽误,直至前不久才由上述两个出版社共同出版,这里谨向为译丛付出辛劳的译者以及编辑们表示感谢。为了今后技术上便于处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套译丛交由我们长期打交道,有着深厚友谊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译

丛更名为“洋人眼中的西藏”，希望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继续关心和爱护这套丛书。我们会努力做好。

清华大学文学院

王启龙

2002年1月11日



John Walter Brown

布鲁克肖像

写在前面

本书主要描述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前陆军中尉布鲁克(Brooke)横贯中国内地和西藏的两次旅行。在本书即将交到读者手里的时候,我必须先讲清楚它因何而来,以及我本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1906年8月1日,布鲁克先生从上海出发开始他的首次旅行。在穿越西藏之后,他于1907年10月返回上海。

1907年11月,布鲁克先生又从上海启程,开始其第二次旅行,“游历”川西和西藏东部。1908年11月24日,在独立的保罗^①地区惨遭杀害。

在上述两次探险中,布鲁克中尉第二次旅行由C·H·米尔斯(Mears)先生陪伴。在这次“游历”中途流产^②后,米尔斯先生回到英国,将他们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写下来,在《祖国报》(the home press)上发表。这些文章反响很大,读者纷纷要求米尔斯先生进一步将他自己及其朋友的经历写成书,以便留下更永久的记录。但是,司各特(Scott)上尉招募他前往南极探险。为这次南极探险做好准备,他当年年初必须离开英国,到西伯利亚去购买狗和矮种马。这样,原本由他执笔写书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肩上了。布鲁克先生的双亲慷慨地把他的日记和旅行中所拍摄的照片交给我,由

① 保罗历史上对彝族的蔑称。但原文如此,为保留此书原貌,在此照译。* 注释符号后的文字为原作者注释,其他为译者注释,下同。

② 由于布鲁克在彝族地区被杀,旅行因此中断。

我任意处理。利用这些日记和照片,利用我自己和米尔斯先生对风景如画的乡村和与世隔绝的民族的观察(这种乡村是白人从未到过的,这种民族是西方从未见过的),我希望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它能够使人记住谁是它的真正原创者;它能够引起一般普通读者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到遥远的土地上冒险、狩猎和旅行。

1880年7月,约翰·威斯顿·布鲁克出生于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附近的芬妮庄园(Fenay Hall)。学校时光是在雷普顿度过的。1898年,他参加了家乡的义勇骑兵团——约克郡骑兵团,并且跟随该队参加了英布战争。他在战争中的一次勇敢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在一个在正规部队中供职的职务。1900年11月,他回到英国,加入了驻扎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第七轻骑兵团。但是,他内心里执著热爱的仍然是旅行探险,到黑色大陆从事探险事业。这一想法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在他内心里澎湃。本来,布鲁克先生并不打算到黑色非洲去,是因为经人引见会晤著名美国侦察员、后来担任东非财团董事的伯恩海蒙少校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到黑色非洲去探险。于是在1902年,他辞去军职,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1903年4月,他离开英国前往东非。刚一到达,就被派去与布里克(Blick)、布内特尔班克(Brittlebank)和布朗(Brown)等先生一块探险。由于他们的名字英文字母都是以“B”开头,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四位‘布’先生”。他们这支队伍从内罗毕(Nairobi)出发,取道埃尔贡山(Mount Elgon),往北,抵达鲁道尔夫湖(Rudolph)^①的西岸。其间,他们多次断水,并多次同土著相遇,真是险象环生。

1904年1月25日,有报告传到英国,说“四布”探险队被消灭了。不过,随后一周传到英国的消息推翻了这项报告,并证实是中途逃跑的脚夫编造出来的谎言。同年4月,布鲁克先生就返回英

① 肯尼亚名称,埃塞俄比亚称图尔卡纳湖。

国,申请从事探险科学研究。这种研究,使他自己更适合于充当一名探险者。根据他的观察报告,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会员证书。这样,他成为一名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906年3月,布鲁克先生乘船到印度,其目的是组织一次到西藏的探险,以便考察颇有争议的关于藏布江(the Sampo)^①与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s)是否是源与流的关系问题。^②然而,虽然印度政府对此问题非常关注,但是由于刚刚与俄国签订了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而受到限制,不能再从印度进入西藏。不过,布鲁克先生并不死心。他设法只带两名仆人,溜过阿萨姆边界。但是他的企图因被边界官员察觉而未能得逞。边界官员把眼睛紧盯着他,把他截住了。

这样,布鲁克先生只好改变主意,决定从藏北地区进入西藏。1906年6月,他离开加尔各达,前往上海,从那里开始旅行,经由汉口、西安、平凉、兰州,抵达西宁府。这段旅程历时3个月。在关于这段旅程的记述中,布鲁克先生提到了传教士,非常感激他们,称他们“极其善良而殷勤地”“款待”他,是“在那个国家旅行的人们真正的朋友”。在西宁府,他停留大约1个月,以便收集情报资料,筹备马匹、牦牛以及日常用品。1906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从乌尔加(Urgu)(即库伦)到达西宁。三年前(即1904年),荣赫鹏远征军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到库伦。非常幸运,中国内地传教协会会员里德利(Ridley)先生和布鲁克先生得到了达赖

① 藏语中意为“江”。

② 直到1910年左右地理学界才证实它们是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在此以前这问题一直是一个悬案。证实清楚这种关系是当时西方人到这片地区探险的目的之一。

*指1907年英俄关于两国如何侵略中国西藏的《英俄条约》。但是,该条约中并未载明,在此前为达成条约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同意此条通过私下换文确认,不必载入条约正式文本中。

喇嘛的接见。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英国人。

既然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的第二次企图一切准备就绪,布鲁克先生就从库库淖尔(Kokoner)进藏^①。他从该湖的北面,首先到柴达木(Baranr Tsaidan),然后折往南,穿越唐古拉山口(the Tangla Pass)。这趟旅行充满了冒险,特别是对于他这样一个对藏语不通、其随从不仅无用反而更糟糕(实际证明就是如此)的人来说,更加充满了艰难险阻。有好几次,布鲁克先生一行遭遇果洛人(the Goluk)^②的抢劫,非常危险。其中有一次,布鲁克先生没有带枪就骑马上路,遇到了果洛抢匪,他不得不徒手同一名抢匪格斗。

布鲁克先生一到达玛格呼拉(Magehulla)(该地位于他此行目的^③地以北大约200英里远的地方),就被一大群西藏人包围起来。虽然他多次友好地拜访喇嘛,但是他们仍然坚决反对他继续朝南到达其目的地。他一旦将行李放在骡驼背上准备出发,藏军士兵就把行李卸下来,不准走。由于一人面对数百人,势单力孤,他只得恨恨地罢手,沿着来路,再度向北而回。这一天是1907年4月30日,布鲁克先生一行仅剩两人和几匹半饥半饿的骆驼。带着他们,布鲁克先生和一支蒙古人商队同行,并同商队首领建立了友谊。他们一起旅行了好几个星期,商队首领还邀请布鲁克先生到他家乡。在他家乡,布鲁克先生享受到很有趣的狩猎活动,所获猎物的价值也颇高。

在塔莫尔村(Tarmor),非常凑巧,布鲁克先生未能同著名探险家斯坦因(Stein)博士见面。看来,虽然斯坦因博士也在同一天

① 藏语所称的青海湖。

② 藏族支系,居住在青海玉树地区。

③ 作者未说明目的地到底指何地,从上文来看,应该是布拉马普特拉河,但从逻辑推理来看,应该指拉萨。